

[巴勒斯坦]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马赞) 著

奥斯陆之路

طريق أوسلو

—— 巴以和谈内幕



奥斯陆之路

——巴以和谈内幕

〔巴勒斯坦〕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马赞）著

李成文 拱振喜 张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8661

根据黎巴嫩书刊出版发行公司 1994 年阿拉伯文第 1 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崇禄

封面设计：孙 敏

版式设计：车胜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 / (巴勒斯坦) 马哈茂德·阿巴斯 (阿布-马赞) 著；李成文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2

书名原文：The Road to Oslo

ISBN 7-5012-0885-9

I. 奥… II. ①马… ②李… III. 中东问题，巴以和谈-概况 IV. 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469 号

图字：01—97—0692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8.5 字数：216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法塔赫”运动首次派遣代表团出访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一个出访代表团由已故的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访问的也是这个友好的国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代表处又是在北京。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

自从我们的革命爆发以来，我们每每派出代表团访问这个友好的国家，总是满载着军事、经济、人道主义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归，带着对我们革命成功的最美好祝愿而归，并带着朋友们对他们能力有限、力不从心的歉意而归。这些又意味着什么？

每当我们经历了一场战斗、或是遭遇了敌人的侵略，第一个来到我们总部的总是中国大使，前来探访我们，表示慰问，了解战果，询问情况，并提交援助物资的清单，以补充我们在战斗中、或是在敌人的入侵中所蒙受的损失。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与这个友好的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友好交往中，我

们自始至终所听到的是：请同志们根据你们人民的利益自主决策，你们的决策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同样，我还是要问：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并非一而再、再而三的“巧合”，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对此，巴勒斯坦人民念念不忘，决不能须臾忘怀，这一切将永远牢牢铭刻在他们的心中。

阿布-马赞（签字）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Arabic script, reading 'أبو مازن' (Abu-Mazin), enclosed within a large, hand-drawn oval loop.

目 录

中文版序.....	阿布-马赞 3
-----------	---------

第 一 章	飞往华盛顿	1
第 二 章	开端	12
第 三 章	瑞典的作用	22
第 四 章	与利库德的秘密联系渠道	41
第 五 章	与工党的间接接触	61
第 六 章	马德里招牌	99
第 七 章	挪威的作用	121
第 八 章	奥斯陆渠道	131
第 九 章	文件	166
第 十 章	决定性时刻	199
第十一章	保守奥斯陆渠道的秘密	209
第十二章	加沙—杰里科方案的来龙去脉	224
第十三章	突然事件	231
第十四章	展望未来	245

附 件	254
(一) 阿拉法特主席呼吁巴勒斯坦人民谋求和平与建设、 放弃恐怖主义的信件	254
(二) 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 伊扎克·拉宾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相互 承认的换文	255
(三) 关于东耶路撒冷的承诺的有关信件	257
(四) 以色列巴勒斯坦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	259
(五)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	265
(六) 联合国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	266

第一章 飞往华盛顿

缅怀与回忆：

1993年9月12日，我们代表团乘坐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提供给巴勒斯坦领导人使用的皇家专机，离开突尼斯前往华盛顿。十个半小时的飞行中，我大都沉浸在对过去三十年斗争历程和近半个世纪颠沛流离生活的回忆之中。此行是为了回归家园，抑或去签字画押，拱手相让大部分国土？我为什么要去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一个或许无法使我们恢复家园、获得安身之地的协议？我们要做的是打开面向未来之门，还是关闭通向未来之路？我们是糟蹋了人民的权利、还是维护了人民的权利？

沉重的担子，巨大的责任，风险可能大于收获。我们的人民将作出怎样的反应？谁将支持？谁会反对？历史又将如何评价我们？

突尼斯到华盛顿之间这十个半小时的

旅程又怎能概括长达一个世纪的流浪之旅呢？处于一个历史性胜利的大门口，我们的脑海中怎能忘却那些在祖国的土地上用鲜血写下光辉篇章的人们？又怎能忘却那些为了这一胜利前赴后继，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呢？

一列百年之旅的列车，曾在许多重要的站口停下，一些乘客下去了，又有一些乘客上来了。迎着狂风大漠，面对艰难险阻。列车踉踉跄跄，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开足马力，继续着它的旅程。

在黑暗笼罩的大海上，一艘被波浪颠荡的航船，时而失去导航仪，时而又失去舵把，谁也不知道它何时方能抵达安全的彼岸。

四次革命，五次战争，其间还有许多次革命和斗争，战士们坚持不懈，没有喘息和休整的机会。我们的先辈和他们的后人从不知何为安顿，也未曾有过人生的享乐，他们一直在战斗，为了民族的希望而战斗。这希望似乎虚幻而渺茫，但他们从未绝望气馁，也从未放弃信心，而是把旗帜和信仰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让我们怀着敬意，牢牢地记住他们——巴勒斯坦大教长，艾哈迈德·希勒米·阿卜杜勒·拜吉，艾哈迈德·舒凯里，叶海亚·哈穆达，等等。他们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们也绝不会忘记那些革命烈士和领导人，从伊兹丁·卡萨姆、谢赫·费拉汉·塞阿迪、谢赫·哈桑·塞拉迈、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到阿卜杜·拉希姆·马哈茂德，还有许许多多当代的烈士们。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切，是他们用鲜血铺平了道路，打开了大门，带来了希望。艾哈迈德·穆萨是第一人，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哈穆德、阿布-萨卜里、阿布-阿里·阿亚德、卡马勒·欧德万、穆罕默德·纳贾尔、卡马勒·纳赛尔、盖桑·坎法尼、塞阿德·萨伊勒、马吉德·阿布-沙拉尔，以及成千上万的干部、军官、战士、儿童、老人和妇女。

罪恶的手夺去了烈士之首阿布-杰哈德的生命，叛徒之手夺走了战场上的勇士和出色的组织者阿布-伊亚德和献身精神的代表阿布-胡尔的生命。长长的行列，鲜血汇集成了河流，在每一个家

庭、居民区、村庄、难民营和城市流淌。

希望正在开始变为现实，梦想已经开始成真，我们的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归属，看到这一切，烈士们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阿布-伊亚德的儿子向父亲说，我本无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归属，是您用鲜血为我换得了民族身份与归属。

在赴华盛顿途中，许多问号堆在我脑海里。端详着周围的面孔，我想起那些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们，又想到自己。我就是那个将在全世界面前签署协议，从而担负起责任的人，而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在场或不在场，都可以宣称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我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我在为我的人民做一件历史性的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其次，我也担心双方的错误实践和不同信仰将把这一成就毁掉。因此，自己才有一种矛盾的心情，越是重视这一成就，对它的实施就越感到担忧。

我们到达了华盛顿安德鲁兹空军基地，那是专门接待到美国来的国宾要人的机场。接待我们的有国务院礼宾司长爱德华·吉尔杰因和阿拉伯国家使节以及一些巴勒斯坦知名人士。我们立即前往饭店，一到那里便被淹没在事先安排好的详细接待日程之中。一大批美国、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士在迎接我们。在那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前总统卡特和布什。卡特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倒不如说更像一位牧师或者神父，他的脸上刻着纯洁无邪的微笑，使得见到他的人从第一刻就会爱上他，感觉可以与他相处得彼此非常贴心。

布什则显得像个斗士，这位在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担任过总统的人，在实现了这一切成就，接受并且认可了一场民主游戏的结果之后，将这一切成就交给或者被迫交给了其他的人。

一夜之间，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从美国政府心目中的恐怖分子，变成了备受白宫青睐的座上客。这使我想起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和“日内瓦宣言”之后美国开始同巴解对话的那

一阶段。那曾被认为是巴解的和平攻势。那场没有持续多久的对话，在绕了一阵圈子之后便停了下来，而更重要的对话当时正在这些官方会晤以外的密室里进行。当时，我和美国驻安尼斯大使罗伯特·佩尔特罗及他的助手埃德蒙·赫尔正在深入研究阿以冲突的实质性问题。当时讨论的核心正是我们已在心中确立的目标，即以巴以对话作为和平的钥匙。当时，这位美国大使认为，只有工党才能开始这种对话，同时他表示担心坚持顽固立场的利库德会在以色列上台。

我站在白宫草坪的讲台上，内心里回首着往日那些岁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站在我的左边，旁边一步之遥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此之前，我们曾在白宫内的一个大厅里等待仪式开始。总统和夫人、戈尔副总统和夫人依次同我们握手寒暄，然后是卡特总统、布什总统，接着又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以及现已去世的挪威外交大臣——一位出色地主持了奥斯陆秘密谈判的人。

下午一时半，我们站在灼热的阳光下，而现场的气氛更是热烈。在这白宫的草坪上，灿烂的太阳放射着光芒，我感到我们的人民沐浴在阳光之下，在那些曾经否认他们生存权利的人面前，他们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几千双眼睛，几百架摄影机，几百万人热烈地注视着这一场面，观看着那不足几米见方的台子，那上面写下了中东地区、也许是全世界的新的历史。我发现，出席仪式的人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像是试图钻进我们心脏、大脑和身体里，去洞悉我们的感受和想法，去摸清我们的脉搏，数一数我们的心跳。

我讲完话后，没有按照事先的礼宾安排与克林顿总统握手，而是径直走过去同拉宾、科济列夫和克里斯托弗握了手。这一举动尽管违反了商定的礼宾程序，但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许多人问到我当时的很多举动和目光，他们说，当我坐下签字时，是克林顿总统为我挪的椅子，但我竟没有注意到，大概当时的热烈气氛使我忽略了许多事情吧。

就在几天前，还不曾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敢于同巴解会晤。就在几个月前，任何以色列公民都被禁止谈及巴解组织以及会见它的负责人。有许多我们秘密会见的人都希望保守秘密，以免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受审坐牢。我们的确为他们严守了秘密。

那时，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点，即如何实现和平。我们知道那些同我们谈话的人并不是决策者，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从我们这里听到的东西转达给可能从他们那里听到我们声音的人。我们还知道，要改变以色列舆论的倾向要走很长的路。这种舆论不理解我们，不愿理解我们，也不想让别人理解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这种努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在我们同以色列交战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以色列法律禁止这类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时，以色列方面的注意力常常体现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不仅是某些个人的兴趣，而是以色列官方提出的问题。因为以方当局和官员们都想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真实观点。另外，这些问题也从未局限在以色列人中间，而且也或多或少为一些美国方面的人士，如哈罗德·桑德斯、比尔·坎特、欧文·欧文和丹·亚伯拉罕等所感兴趣。这些问题包括：

- 你们真的想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吗？
- 这个国家可否以邦联方式与约旦相联系？
- 它是否将同苏联人有关系，到什么程度？
- 它是否将有军队，什么性质的军队？
- 你们如何看待和平状态下同以色列共处与合作？
- 巴以将以什么样的边界相联？
- 你们对解决难民问题的看法如何？
- 你们如何看待耶路撒冷圣城的未来？

当时，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寻求民族独立的人民一样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我们愿意建立与约旦的邦联，如果以色列愿意加入这一邦联的话，我们愿意认真考

虑。至于同苏联人的关系，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将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作为共产主义者在中东的基地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当我们的美国和以色列对话者们对这个巴勒斯坦国存在军队表示担心时，我们对他们说，军队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防务。防务有了保证，军队将不再需要。并且，美国人有没有可能派一支军队把我们同以色列人分开呢？或者他们是否准备接受由一支国际部队来担负此使命？

所有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要求我们承认联合国第 242 和 338 号两个决议。他们强调说，承认这两项决议，将打开通往和平的道路，以色列政府必将加入同巴解的谈判。而奇怪的是，在华盛顿和奥斯陆举行的所有各轮谈判中，最困难的一点正是实施 242 和 338 号决议。以色列代表团直到最后一刻，特别是在奥斯陆，还在提出方案来避免使用“执行”这两个决议一词。

使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同样受窘的是，我们说，我们希望实现完全共处，也希望有一个对双方完全开放的边界，包括开放就业、居留、居住、货物、商品及货币交换等等内容。当他们试图拒绝这一想法时，我提出了替代方案，即完全关闭边界；也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我要求他们提出任何一种适于共处的形式来，我们都愿意接受！

当时，以色列温和派面临的最复杂问题是难民问题。他们不想谈难民问题或者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依据。因此我们同“公民权利运动”党关于难民问题的谈判中断了。因为该党谈判代表迪迪·朱克尔顽固拒绝涉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决议。那是在经过我们同该党几轮谈判之后，在 1989 年 1 月 31 日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发生的事情。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避免在谈话中涉及，并建议将这个问题往后放一放，但还有许多人把它看作一条不可触及的红线。

在飞往华盛顿的摩洛哥国王专机上，所有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仿佛自己要在抵达华府前的一个或几个小时内总结一下这漫长的斗争与磨难，以便开始一次新的、不知何时结束的长征。我没有幻想我们将签署的东西将会结束一切；反之，我相信它将是许多事情的开始，尤其是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在这个协议中得到解决，有许多难点尚未得到澄清，仍需艰苦而持久的努力。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曾几何时，我潜心研究过以色列社会，并热衷于接触希望或者愿意与我接触的以色列人。在那段日子里，我受到“法塔赫”内部最了解我的人的许多批评和讥讽。他们诘问，你接触的这些普通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改变以色列社会吗？这些处于以色列社会最底层的极小一部分人能有什么影响呢？

1968年，一些“法塔赫”领导人提出了巴勒斯坦民主国家的口号。这一口号叫响了很长时间，直到被以色列的宣传所压倒。言者无心，而我却从中悟出了一条重要的道理，即：最终必须与我们所忽视的这个以色列社会共处。一切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们必须实现和平，然而我们将如何才能实现和平呢？往日的回忆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

第十六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重申了巴解组织与以色列民主和进步力量接触的立场。那次会议结束之后，阿布-伊亚德于1983年3月11日访问了匈牙利，与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谈了全委会的决定，并着重解释了关于与犹太人力量接触的决定。这使匈牙利人很惊讶。他们立即告诉阿布-伊亚德，“现在就和平运动”的一个代表团正在那里访问，如果阿布-伊亚德和以色列人都不持异议的话，这是一次安排双方接触的良机。

这个消息使阿布-伊亚德感到很突然，因为他以前从未会见过以色列人，他自己对这类会晤也未作好准备。当时，他可能只想谈谈而已，并非真想去做，但在那种场合又不好拒绝，会晤就这样进行了。以方参加的有著名女记者哈娜·扎米尔及工党的一些

人士，第一次会见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

每当我回想起双方这次会晤，就回忆起巴以争端的所有阶段。因为，这次会晤总结并浓缩了七十个年头。会晤开始时是敌对性的，双方言辞激烈，相互指责。而结束时，双方都充分相信必须建立和平，实现两个民族的利益和自决权。我们商定对这次会晤保守秘密，但是哈娜·扎米尔却在她的《国土报》统统抖了出来。

在此之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代表团于1989年7月3日至5日，来到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代表着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安德鲁斯时代和平共处的典型城市进行会晤。实际上，以色列代表团中并非都是以色列人，其中还有获得以色列国籍的东方犹太人或者生活在世界各地如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摩洛哥的犹太人。

四十五个人轮流发言，共同回忆五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们曾和平共处的历史。在以方代表团中有一些持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他们来聆听那些犹太人的感受，听他们讲述生活的成功经验以及今天由于环境不同未能和平共处的失败。在巴勒斯坦代表团中，也有一些与巴勒斯坦人一道为重现那悠久的共处历史而斗争的犹太人。但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局面，他们的教友们对他们的看法不无气愤和苦涩。

这次会晤是在关于会谈程序，座位安排，讲话顺序和谁先向对方提出和平等问题的艰苦谈判中开始的。因为，我们来自于两个敌对阵营，相互隔绝，没有联系，有的只是淌着鲜血的战争。

七十二小时中的前两个小时充满了紧张气氛，好一个紧张的序幕。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谁也分不清在座的属于哪一方了。双方成员畅谈了自己的经历、回忆和磨难。犹太人们喜欢不厌其烦地向巴勒斯坦人讲述他们自己或亲属生活在阿拉伯国家时的经历。七十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想结束，都希望再延长些，再延长些。然而，没有不散的筵席。

利用这个机会，这些与会的犹太人公开表示他们个人赞成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的，以色

列社会已发生了变化，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双方的接触，更重要的还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巴勒斯坦孩子们投掷石块的起义。这些接触正是斗争和起义的结果，它向以色列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顽固下去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必须坐下来谈判。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给他们的声音，使他们受理智和利益的支配，使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们的未来。

几年之后，这一小部分人中有的变成了决策者，有的成了立法机构议会的负责人，并代表着各种倾向，各种政党，尤其是参与执政的工党。1991年9月22日，法新社收到了一条由二十四名工党及另外三个党议员签名的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呼吁书，要求巴全委会委员采取灵活立场，同意召开和平会议；呼吁书还向巴勒斯坦领导人提出，只有在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框架内，巴勒斯坦民族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也只有在这一框架内，以色列才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相安无事。当时签署这份声明的有现任总统魏茨曼和四名现任部长，还有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贝林，他是自始至终负责奥斯陆谈判的人物之一。

新闻媒介曾屡屡传播我和魏茨曼会面的消息。的确，魏茨曼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愿意会晤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负责人，但因受到工党领导人的强大压力终未如愿。他曾因在日内瓦会见纳比勒·拉马拉维，受到沙米尔的攻击差点丢了在内阁中的乌纱帽。尽管如此，我们与他还是有许多间接接触。有一次，他表示希望访问莫斯科。当时苏联对邀请他感到为难。因为那时两国外交关系已中断，并且，苏联人也担心会受到阿拉伯人的批评。当苏联外交部就此事征询我的意见时，我表示欢迎邀请他访苏。这使苏联人感到意外而迷惑不解。我向他们解释说，这个人是以色列的鸽派，支持他、或是接待他来访都无妨，反而会有益。结果果然如此，魏茨曼访苏后，苏联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并将巴解组织驻苏办事处升格为巴勒斯坦国大使馆。奇怪的是，在以色列却有人指责是魏茨曼要求苏联人将巴解办事处升格的。

华盛顿协议签字几小时后，我同佩雷斯在其下榻处进行了会见。这次会见并不是我提出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接到我方一个电话，说要求修改协议双方签字人的姓名。结果，这位主任以为是我要求见佩雷斯。尽管这是个误会，但和佩雷斯共同签署了协议后相互见个面倒也无妨，特别是新闻界已不止一次地风传我们会面的消息，而每次他都没有对这些消息加以否认过。

而今天，我们的会见是在新闻界面前进行的，持续了长达四十分钟。出席会晤的还有参加奥斯陆谈判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以及阿卜杜·拉布。我和佩雷斯注意到，双方代表团成员之间谈得很亲热，证明双方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关系，许多共同的回忆把他们连在一起。我对佩雷斯说，看来你我二人倒成了这次会见中的陌生客了。在谈到未来时，佩雷斯试图作出客观而现实的姿态，他表示了从经济上开发被占领土的愿望，并提到他最近访问欧洲时，曾要求欧洲人制定一个发展这一地区经济的计划。我仔细琢磨着这位我曾通过新闻媒界，来往信函、奥斯陆谈判以及我所读到的数十份关于他的报告所认识的人物，以便把印象中的他同眼前这个真实的他加以比较，我发现二者没有什么不同。佩雷斯是一个外交家，对未来有着明确的政治观点，实现和平的愿望坚定了他的政治观点。初步的印象，他与拉宾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当我方代表团一位成员对拉宾的一句话表示反感时，他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在说：“别把它太当真了。”接着他说：“你们知道，今天他来了。但就在今天，他的四个士兵被杀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谅解。”然后，佩雷斯又说：“我们可以为一句话吵上一年，但是请相信，我们一旦同意了它，就将严格恪守它。”

佩雷斯的助手贝林参加了会见，我同他进行了交谈，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一开始，我们就毫无保留，不受礼宾约束地谈起来。尽管他已四十多岁，但给我的印象像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他在工党中已很有影响。他是少数同佩雷斯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之一，也不像许多人那样，他从不偏袒拉宾。我还很快地打量了一下乔